

环境伦理学进展：

评论与阐释

主编/徐嵩龄

· 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 ·

环境伦理学进展： 评论与阐释

徐嵩龄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 / 徐嵩龄主编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5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
ISBN 7-80149-130-0

I . 环… II . 徐… III . 伦理学 ; 环境科学 IV . B82 - 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78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

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



主 编：徐嵩龄

责任编辑：李富强 张景曾 屠敏珠

责任校对：吕小玲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5.75

字 数：395 千字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ISBN 7-80149-130-0/B·025

定价：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

主编 李京文 郑玉歆

NO.1 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

实例与理论研究 徐嵩龄 编

NO.2 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

..... 徐嵩龄 主编

总序

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是推动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三只轮子。如果说自然科学给人类提供了认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科学基础，技术科学给人类提供了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技术途径，那么社会科学给人类提供的则是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经济出路与社会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意识形态保障。如果把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归结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那么社会科学的相对贡献可能还会更大一些，因为“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毕竟是社会科学的语汇。

在中国从事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队伍中，长期以来，自然科学部分与技术科学部分相对较强，社会科学部分相对较弱，以至一些明显属于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课题也不得不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与技术科学工作者来做。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环境科学的历史渊源，即中国最早的资源与环境研究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领衔进行的，而且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也一直侧重于科学技术方面。然而，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偏颇，而且这种偏颇的缺憾与日俱增。

上述局面近年来已开始改变。愈来愈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涉足环境与发展领域。他们或将自己原先的研究兴趣（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国际关系等）向环境与发展领域拓展，或是发起和参与社会科学范畴内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多学科研究，甚至发起和参与跨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综合研究。这实在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两年前，我曾衷心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诞生；两年后的今天，我又热烈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的出版。

我对这套《丛书》是寄予很大期望的。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队，拥有一批本领域最高水平的学者、权威，也有广大的勇于探索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并同一些重要国家和国际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套《丛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不求多，务求精，至少尽可能地精。在理论方面，它应保持世界性学术视野，对概念与方法有新鲜的解释与评论，有恰当的纠偏补缺，有独立的创新开拓。在实践方面，它应高度重视中国的实例研究，高度重视国际性或区域性比较研究，努力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模式和政策建议。

我相信，《丛书》会向全国一切关注和参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人们提供帮助，也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留下踏踏实实的记录。

张坤民

1997年8月3日

《丛书》主编序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全球人口的急剧膨胀，人类向自然索取的无止境扩大，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问题已由局部的空气、水的污染，森林、资源的过度开采，发展到自然界有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平衡遭到全球性破坏。科学家们不断发出警告：由于人类对自然的盲目破坏，人类面临着的生态危机、水源危机、食物危机以及能源危机正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让人类认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并非易事。从少数科学家警示、呼吁，到世人逐步理解，认识到自身在将来有“不可持续”的可能，并加以响应，这饱含了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改变或摒弃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种种观念。从把环境问题仅当作一个污染问题，到把环境问题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直到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努力为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采取全球共同行动上形成了共识。然而，实践表明，要使人类将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变为实践要比人类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了对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迫切需求。

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之后，环境与发展问题日益为世界所关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的研究主题。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环境与发展研究热潮中，大量研究人员从传统学科向环境领域转移，环境领域的研

究也日益大型化和集成化。我国环境科学研究也出现类似的趋势。如果说有所差别，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从事环境研究的力量较为弱小，环境研究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层次较低。这与社会科学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应该占有的地位不相称。中国的现实呼唤着更多的社会科 学工作者投入到环境与发展的研究中去。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高度综合的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远非局限于污染的防治和生态平衡的恢复，而且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律等紧密相关。在“可持续性”的规范面前，传统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已不适用。不论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伦理学，还是环境科学都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人类生存环境问题所提出巨大挑战而需要在理论体系上进行改造、重组和创新。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

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所带来的理论挑战的同时，还必须面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将研究内容不断向着可操作性方向深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沉重压力，工业化过程中的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压力使中国在环境保护的努力中遇到种种棘手的选择问题，中国经济与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往往要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以及不同成本与效益组合之间进行选择。

中国经济与环境政策的选择受到多方面难以超越的现实制约：

中国从来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工业化国家当时享有的资源和环境容量。这样一个制约使中国无法回避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要求与相当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支持能力的尖锐矛盾。

中国至今尚未能超越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这使中

国现实地面对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与有效地控制污染排放的难以回避的矛盾。

另外，中国还受到诸如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限的技术能力、激烈的国际竞争等制约，这些都使得中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可行区间非常有限。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环境政策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决策者正确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而政策正确与否则取决于能否将政策建立在科学依据的基础上。这要求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必须在与实际结合上有相当的深度。显然，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类即将跨入 21 世纪。对于人类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世纪转折点，而且意味着进入一个决定自身命运的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1 世纪议程》以及《中国 21 世纪议程》先后诞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两个《议程》以极大的热忱予以响应，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推动《议程》的实施、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和全球的实现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此，我们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的形式把这些成果陆续呈现给广大读者。本《丛书》主要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近年来环境与发展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分析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努力。我们衷心希望《丛书》能对进行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的学者、有关决策部门的领导，及对环境与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有所启发，同时也希望能引发更多的讨论乃至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李京文（理事长） 郑玉歆（主任）

1997 年 6 月

本 书 序

本书是 1997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联合主持的学术研讨会“环境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直接产物。研讨会论文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与会者对有关论题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和积极的论争态度，使研讨会的主持单位认为，系统地选择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关键论题，重新创作并成书出版，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有价值的。

本书的目的，是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进展进行评论和阐释。由于环境伦理学的多学科性质，由于现代环境伦理学流派纷呈，由于环境伦理学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深厚渊源，由于环境伦理学丰富的实践意义，由于环境伦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本书设计包括 5 个部分，即“环境伦理学的生态学之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进展”、“环境伦理学的文化渊源”、“应用环境伦理学”和“环境伦理测度的实证研究”，并进而确定各个部分的选题，从而试图对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进展，有层次清晰的较为完整的说明。

本书的论文，多属专论性质。专论性论文的撰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般来说，它应达到 4 项要求：全面、准确、系统、有所创新。全面，是指尽可能反映论题的全貌，即它的各个侧面，而不能有重要遗漏；准确，是指对有关文献的解读是确切的，而不至于在转述论点时发生谬误；系统，是指应将所述内容安置于

一个恰当的逻辑构架之中，而不是观点的杂乱堆砌；有所创新，是指专论作者在进行评论和阐释时包含着个人的独立创见。这些要求既是本书写作的标准，又应是读者对本书进行评价的标尺。由于专论型论文需要概括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现代环境伦理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尤其在发达国家中相当活跃，由于环境伦理学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世界文化源流的各种典籍，因此，本书的大多数专论均涉及大量的中外现代文献和古典文献。作者们的认真工作，不仅见诸本书论文的正文的见解，同时见诸各篇所附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都具有国内可获得性，因而不失为有志于此类研究的读者的信息之源。

本书第一部分“环境伦理学的生态学之根”为首，是陈昌笃先生的“生物内在价值的生态学基础”一文。生态学这门古老学科已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勃兴。现代生态学研究已拓展到3个层次上：自然系统层次；人与自然作用层次；人类系统层次。它不仅是环境科学公认的基础学科，而且是环境伦理学公认的科学基础。陈先生对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生物多样性内在价值”概念，从生命网络格局和生命进化线系两个角度加以思考，表达了一个职业生态学家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体验基础上的深思熟虑。这些真知灼见应是环境伦理学家阐述和建树自己观念的重要据。

第二部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进展”包括4篇论文。它们依次是杨通进先生的“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雷毅先生的“深层生态学论纲”，章建刚先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与王耀先先生和陈剑澜先生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杨通进先生的论文相当凝炼和精辟地概述了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流派（人类中心论，生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等）的主要观念，逻辑地揭示了这些流派之间后者整合前者并超越前者的非人类中心化的

演进历程，并有创见地提出了环境伦理观的层次性应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设想。雷毅先生论述的是西方环境运动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深层生态学”。这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界和环境运动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环境意识形态。雷先生的评述，涉及深层生态学的缘起，它与“浅层生态学”的区别，它的概念构架和理论内核，它与西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思想渊源，它与西方其他环境伦理学流派的关系，深层生态运动的实践活动，以及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它的反应。雷先生的评述是全面的。颇有意义的是，雷先生还借用深层生态学热衷的方法，对深层生态学自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局限性进行“追问”。章建刚先生是赞同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的。他将他的学术立场建立在对各类环境伦理立场的全面剖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既有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比较，又有人类中心论内部的立场比较），建立在对主要概念（“内在价值”概念）的精细的哲学辨析的基础上，力图获取对自己立场的坚强的辩护力量。章先生对“内在价值”这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的处理，颇具意义。在列陈对“内在价值”概念的诸多环境伦理学理解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基于人类实践能力的定义。任何人都会从他对这一定义的深思中获益：或作为他的同道，会由此踏入对人类中心主义理解的新的阶梯；或作为他的对手，会由此将关于“中心”和“价值”的论争推上一个新的层次。王耀先先生和陈剑澜先生鲜明地倡导将环境伦理观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基础上。这种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环境意识形态的主流，尤其是政府的环境意识形态的主流。王、陈二位先生超脱了环境伦理学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惯见争议，从理论上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进行阐述，同时，也将这一论题提给一切真正关心环境伦理观的实践意义的人们。

纳入第三部分“环境伦理学的文化渊源”的有3篇论文：段琦女士的“当代西方基督教的绿色化”，魏德东先生的“佛教的生态观”，张云飞先生的“中国儒、道哲学的生态伦理学阐释”。段琦女士的这一篇，在中国基督教界无疑开了环境保护研究之先声。她全面而细致地评述了西方基督教对环境问题认识与处理的历史过程，教会内的主要环境伦理模式和主要生态神学流派。段琦女士的论文，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无论是中国基督教会，还是中国政府中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都会从西方基督教会环境运动中由开始时面对指责的尴尬、到后来的积极参与、再到底现在的借环境问题而复兴的过程中，受到丰富的启示和教益。魏德东先生的论文同样具有先导性质。佛学一直被西方环境伦理学界的生态中心主义论者视为重要的文化源流之一。对于佛学与环境伦理学之间思想联系的研究并不鲜见，但是，对于佛学与作为环境伦理学科学基础的生态学之间思想联系的研究，则是相当新鲜的。生态学是自然科学各门类中就研究对象和内容而言最接近佛学的，因而可成为佛学的某种科学基础，或其科学性的某种证明。魏先生的论文至少在中国是开创性的。魏先生首先通过对佛学与生态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互质、互证、互补关系。他接着从哲学、伦理、实践角度多侧面地阐述佛教的生态观。魏先生的这些见解，不仅会深化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而且会促使对佛学和生态学彼此从对方中获得新的智慧基因，从而对各自研究和发展都具有启发性意义。张云飞先生的文章是一个老主题，但结论却是新鲜的，引人入胜的。张先生的基本方法是广征博引。这种立足征引而毫无演绎附会的方法，使他对儒、道哲学的生态道德观、对作为生态伦理观基础的自然观，以及对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三原则（生态从善性，生态弃恶性和生态完善性）等方面的结论是难以诘驳的。当代非常时兴的环境伦理观

(如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等)，均在儒、道哲学中有全面体现；在某些方面，儒、道哲学中的表述还更深刻些。这一点按说不应奇怪，因为现代的环境伦理观是西方知识界对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的结果，而儒、道哲学的生态伦理观则是中国先哲们的哲学认识与社会实践相一致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如果将西方的环境伦理观与中国儒、道哲学的生态伦理观进行比较，并将这一比较置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曲折的历史背景之上，一定会使人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有无穷的思考。张先生文章的一个具有同样价值的副产品，是对中国古代生态学认知水平的发掘和展示。这真令现代中国人既振奋又惭愧。中国的确有着伟大文明的过去，但是的确在近、现代落伍了，至今仍在追赶之中。

第四部分“应用环境伦理学”，包括4篇论文：章铮先生的“市场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余谋昌先生的“政治·生态·伦理”，任余先生的“国际环境问题与国际层面环境伦理”和徐嵩龄先生的“论理性生态人：一种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行为模式”。章铮先生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制度现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致接受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伦理建树於市场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然而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使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完善性受到质疑。章先生正是由此讨论市场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的关系。作为经济学家，他对市场经济伦理的表述是相当精辟的。如果把环境伦理定义为服务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那么章先生认为，市场经济伦理对解决代际问题是不够的，但对解决代内问题是合适的。由于他对论题所作的经济学分析是相当逻辑的、清晰的，所以他的观点为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树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统。余谋昌先生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政治领域。这一研究方向应当得到中国环境伦理学界的认真关注。余先生从历史政治到现实政治，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从政治

生态行为到政治生态伦理规则，全面地阐述了“政治·生态·伦理”这一论题的内容。由于他笔触揭示的各类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们无疑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对象。**任余先生**直接切入国际环境问题中的环境伦理规则。他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主线，在评论了现有环境伦理模式在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不足后，提出一种全球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国际层面环境伦理观，试图从环境—经济—政治多角度地丰富对伦理规则中“作为公平的正义”概念的理解。他进一步将这种环境伦理观应用于对全球CO₂减排问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伦理规则探讨。任先生的努力反映着来自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声音。**徐嵩龄先生**在分析环境意识和生态伦理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生态人”概念。这一概念使环境伦理在塑造人类行为模式上更具操作性，并以此作为“经济人”、“道德人”概念的对照与补充。

在“环境伦理测度的实证研究”部分，是**洪大用先生的“环境意识及其计量研究：中国案例”**。在人文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定量化已成为一种潮流，在环境伦理学领域也是如此。无论是对作为环境伦理的初级形态的“环境意识”，还是作为对环境伦理的高级形态的“伦理规则”，定量化研究的关键是使研究主题可测度化，使研究方法规范化，使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可比较性。洪大用先生的论文的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洪先生通过环境意识调查表设计、计分规则中的二次加权处理，使环境意识成为一种可测度量；另一方面，他通过抽样设计、计分规则设计和环境意识的特征分析等，使其研究规范化。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单个论点和方法的新颖性，而且也在于其整体的规范性。后一点会使它成为此类研究中有长久价值的参考文献。

认真的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表达的环境伦理学主张是多元的，有些甚至是对立的。这一点大体反映了国际与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现状。观念的多样性（plurality）是环境伦理学的特点，

尤其是仍处于创建中的环境伦理学的特点。我们希望，本书表达的这种多样性能够激发、扩大、深化读者对环境伦理学的认识和研究兴趣。中国无疑需要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和环境伦理观建设。如果说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应有自己的特色，那么这种“特”应当表现在适应当代中国发展转型期中全面制度创新的需要，应当表现在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汲取并与中国自身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的融合。中国应当也能够在环境伦理学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模式，如同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正在实施的变革模式一样。谨以本书奉献给为中国环境伦理学建设而孜孜努力的人们，愿它能为这一建设过程提供一级认识阶梯。

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同志一直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环境伦理学领域中的研究活动。张坤民先生和王耀先先生不仅参与组织“环境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而且关注和支持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王耀先先生拨冗披览了本书书稿并提出指导性意见。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及本书编者对于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深致谢意。

本书是一次严谨而和谐的学术合作的结果。作者们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表现了令人感动的切磋和精益求精的负责精神。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专业委员会主席余谋昌先生无私地贡献出他个人珍藏的国外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李富强先生、张景曾先生、屠敏珠女士、吕小玲女士和盖永东先生为规范和提高本书的出版质量付出了极大辛劳。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龙嗣明女士协助处理许多繁杂事务。这里向他们一并致谢。

徐嵩龄

1998年10月7日
于迁居太阳宫之始

目 录

第一部分 环境伦理学的生态学之根

- 生物内在价值的生态学基础 陈昌笃 (3)

第二部分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进展

- 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杨通进 (15)
深层生态学论纲 雷 毅 (71)
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 章建刚 (123)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王耀先 陈剑澜 (156)

第三部分 环境伦理学的文化渊源

- 当代西方基督教的绿色化 段 琦 (169)
佛教的生态观 魏德东 (215)
中国儒、道哲学的生态伦理学阐述 张云飞 (251)

第四部分 应用环境伦理学

- 市场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 章 锋 (315)